

崇文学朮文库

辞书学丛稿

邹酆 著

崇文书局



辞书编纂在我国历史悠久，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具有明确的辞书意识的辞书理论，即辞书学。汉语辞书学包括辞书编纂原理与方法、辞书评论、辞书史与辞书学史、辞书学人辞书观四大部分。本书诸篇就此作了初步的理论探索。而这，正是当今各类辞书的编纂者、研究者与使用者所最需要的了解的。



崇文学朮文库

湖北大学古文献研究书系

辞书学丛稿

邹 酆 著



崇文书局

(鄂)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辞书学丛稿/邹鄯著. —武汉: 崇文书局, 2003

(崇文学术文库)

ISBN 7-5403-0637-8

I. 辞… II. 邹… III. 辞书学—文集

IV. H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0289 号

出版发行: 崇 文 书 局

(武汉市黄鹄路 75 号 430077)

印 刷: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430074)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插 页: 2

印 张: 12.2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序

邹酆先生于2001年出版了《辞书学探索》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几十位知名学者专门致信祝贺和赞誉。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先生致信说：“先生为辞书学名家，无论是宏观或微观研究，均造诣颇深。四大板块，块块有新章。大著为中国辞书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特此祝贺。”何先生表达了学者们的热忱和心声。可喜的是，邹酆先生继《辞书学探索》之后，又拟推出《辞书学丛稿》。本人有幸先睹为快。《丛稿》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虽然仍为辞书学诸问题，但决无重复之嫌。揣摩其意，首先是拾遗补阙。

在《探索》中，有一个板块——《中国辞书学史》，从两汉至明清（分别为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每个时代一篇专论——《××（时代）字典编纂理论概观》。这些专论高屋建瓴，形成了两千年来中国辞书学史的基本构架。明清以下，更有一组论文，分别论列现代词典学的萌芽、生长、形成和系统化，重点突出，体现了作者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治史思想。惜乎中间缺了一截，即近代的字典编纂理论。翻阅《丛稿》，有一

篇专论——《近代字典编纂理论概观》，正好补足《探索》之缺遗。

其次，拓宽加深。

应该说，《探索》已从辞书原理、辞书编纂、辞书评论和辞书学史等方面架构起中国辞书学，其涉及的领域之宽和论证之深，都令人欣慰。而《丛稿》又在《探索》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从涉及词典的类型看，已由语词而及百科、专科；在语词词典中，由通用字典、词典而及成语；从涉及的地域看，由海内而及海外。

在辞书评论方面，就原则、标准和方法诸方面进行立论，进展相当突出。《丛稿》站在时代的前沿，关注、思考辞书学中的现实和迫切的问题，有感而发，与时俱进。虽为一家之言，但与同类文章相比，视野更开阔，意见更具体，可操作性也更强。

在理论建树的进展方面，《丛稿》关于辞书编纂法的探究尤为突出。准确地说，对语义派生的探究成绩卓著。词语有形，有音，有义，音和形是词语的物质外壳，义是词语的灵魂。词义是词语诸因素中最富于变化、最难把握的因素。辞书编纂者，特别是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者，最大量最要紧的工作是对词义的认知和处理，诸如义项的概括、区分、系联，常常面临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往往出现概括不周、区分不妥、系联不当的偏差。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向来是辞书学界关心最多、议论最热的问题。尽管如此，但多半就事论事，

难中肯綮。而《丛稿》则从语义派生的规律中，特别是从修辞派生、语音派生和语法派生的规律中去探究词义的变化，这就抓住了词义发展变化的源头。虽然个中观点未必尽善，辞书同仁亦不免见仁见智，但只要假以时日，充分研讨，就不难逐步精进，弃异趋同。果如此，必将启发我们清醒地认识语义派生的规律，引导我们在认知和处理语义的过程中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而大大增强辞书编纂工作的科学性。因此，其启导作用当毋庸置疑。

邹酆先生的《探索》与《丛稿》都是论文结集。两本著作共收集论文83篇，计72万余字，看似单篇散论，实为一个整体。正是这一篇篇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论文，共同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国辞书学史和辞书学体系。邹酆先生本来是一位文艺理论工作者，从事辞书编纂和辞书研究是进入天命之年以后的事。正因为这种特殊经历，他开始并没有构建辞书学或者中国辞书学史的宏愿，甚至也没有写作辞书学专著的打算，只是结合工作的需要关注和研究辞书学方面的某些问题。但他能锲而不舍，推而广之。二十几年来，他凭一己之力，不憚年老和病痛，一方面，密切关注辞书学的热点问题，积极投身于各项讨论和研究；另一方面，注意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在浩瀚的典籍中披沙简金，勤勤掇拾。可以说，凡是中国历代的重要辞书著作，包括这些著作的重要注本，即所谓“字典的字典”，他都一一仔细研究过，而且上挂下连，左右比较，屡有

创获，咸有专论。正是众多的个案研究和专论，牢牢地夯实了根基，因而《探索》和《丛稿》所构建起来的辞书学和中国辞书学史，必将卓立于学术之林。

是为序。

宛志文

2003年6月

目 录

序	宛志文 (1)
---------	---------

从历史事实出发

——论我国古代辞书学早已存在	(1)
论许慎的字书观	(17)
郭璞“两注”中的字典编纂论	(28)
王念孙字典论浅析	(39)
刘复的大型字典义项论	(49)
陈望道“以语言为本位”的词义论与词典释义	(59)
从《子云乡人类稿》析殷孟伦的辞书观	(76)
姜椿芳的百科辞书编纂观	(87)
近代字典编纂理论概观	(102)
《说文解字注》的“浑言”和“析言”	(118)
《说文解字义证》的“博证求通”特色	(124)

试论王力的新训诂学	(134)
-----------------	-------

论陆宗达的词义“比较互证法”	(150)
----------------------	-------

论语义派生的一般规律	(162)
------------------	-------

修辞派生的特征和类型·····	(172)
语音派生与词典编纂·····	(181)
词义概括与义项概括·····	(193)
字典义项的完整概括·····	(208)
多元化词义引申与多义词义项概括·····	(218)
论词义信息与词典义项·····	(235)
辞书的全民性与倾向性·····	(252)
《词典研究丛刊》(1~12辑)对大型字典编纂法的 理论贡献·····	(265)
辞书评论的原则、标准和方法·····	(276)
《汉语大字典》的义项理论与实践·····	(286)
台湾《中文大辞典》的特色和价值·····	(296)
汉语成语词典编纂立体网络化的新尝试 ——《汉语成语大词典》评介·····	(306)
《引用语大辞典》的编纂特色和理论价值·····	(314)
《中国对联大辞典》指误·····	(324)
发展辞书原理是辞书评论的天职 ——论《说文解字通论》对汉语辞书学的理论阐发·····	(334)
我国专科辞典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雏形 ——评《专科辞典学》·····	(349)
新世纪辞书论坛绽放的一株报春梅 ——《现代辞典学导论》读后·····	(363)
汉语成语词典编纂规律的新探索 ——读《语法语汇问题论集》·····	(373)
后记·····	(381)

从历史事实出发

——论我国古代辞书学早已存在

我国古代有没有辞（字）书理论，即辞书学，这是当前颇有争议，值得加以探讨的重要课题。眼下两种对立的观点是：一种认为“编纂这些字书就必须发凡起例，各有一套编纂原则和宗旨，还要选词立目、注音释义以及引用必要的书证”，故“辞书学（或字书学）实际可以说已经存在”，并据此提出“中国古代辞书学”概念；^①另一种是对上说持有异议，认为虽然“辞书学研究各种辞书编纂原则和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辞书的编纂原则和方法是辞书学理论”，因此不同意“许慎时代就有了辞书学”，断言“中国古代辞书学”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并指出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极端观点”。^②我认为，这一争论不仅关系到我国古代是否有辞书理论，还广泛涉及辞书编纂原则与条例算不算是辞书理论，辞书理论究竟是来源于编纂实践之中，还是游离于编纂实践之外，辞书编纂能不能脱离理论的规范指导等重大问题。对这次争鸣中所暴露的问题作一番探究，无论是对深化辞书理论与实践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是对提高当代辞书编纂的理论水平，都具有极其明显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古代有无辞书学，首先有赖于对辞书编纂原则与方法的理论性质的确认。而要确认编纂原则与条例的理论内涵，要求我

们从尊重两千年来辞书编纂的历史事实本身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其作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这里，既不能撇开历史事实想当然，用简单的概念推理去代替实际的历史考察，又切忌以现代的，甚至是西方的辞书观念作为衡量的标准。

辞书编纂原则与方法的制定是不是理论研究？这，也应由编纂实践来回答。为了编好辞书，必须先要制定收词立目、正形注音、引书释义、编排查检等编纂条例，用以规范指导编纂实践。但这些原则条例绝不是凭空而来，必须根据编纂实际需要来制定。制定编纂条例本身就含理论性质，就是必不可少的理论研究。这就是说，辞书研究产生于规范与指导辞书编纂实践的需要。辞书框架设计、编纂体例、编写细则、编审程序等，正是紧挨编纂实际，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探索的产物。而编纂工艺与实践，正是作为理论研究成果的编纂条例的具体化、技术化与手段化。其理论性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只承认辞书学“研究”辞书编纂原则和方法，而否认编纂原则和方法是理论探究的成果，本身具有理论性质的看法，是不符合辞书编纂实际的，因而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古代辞书理论是否曾经作为自成体系的学科存在呢？我认为，著名的语言学家何九盈先生，在判断中国古代语言学是否作为学科独立存在时所提出的检验标准，对于衡量脱胎于古代（传统）语言学，又风格独具的古代辞书理论是否已成为学科，也还是适用的：

“当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资格时，首先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科学体系，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成果。”^③

倘用这把尺子来度量，我国古代辞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基本够得上这个杠杠。古代辞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辞书及其编纂、建

构与发展规律。其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贴近编纂实践，以序跋、凡例、评论，以及释文等多种表达形式，对当世与历代辞书编纂经验作出理论概括。我国历代辞书理论又具有区别于文籍注疏的自成一格的研究体系，并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说，传统语言学早已作为包罗广泛（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的大学科而存在，那么，古代辞书理论是作为其分支学科，在独当一面发挥作用的。而且，传统语言学主要研究成果大都凝聚微缩在历代辞书之中，是通过辞书的字项训释方式展现出来的。

（二）

古代辞书理论能否作为学科而存在？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只能来自于对古代辞书编纂的实际，作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考察。首先，应从辞书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它是否对辞书概念、性质特征与社会功能有特定的认识，并作出了不断深化其认识的合理论述。

在未有字书、字典概念之前，许书被定名为《说文解字》，表达了许慎对辞书的性质和作用的初步认识。《方言》、《释名》、《通俗文》的命名，则是作者们对不同类型辞书的特性与功用的理解的直接表达。而《尔雅》则公开指出，辞书的任务就在于让各地方言“近正”，即以通言沟通方言。《尔雅·序篇》指出：“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今异言也。”表明《尔雅》的历史使命还包括以今言疏导古言。《释诂·释典艺》：“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为正也。”《尔雅》、《释名》的作者，对辞书沟通古今方俗的特性与作用，作出了粗浅而提要的理论发明。南北朝初期，出现了“字书”概念以及以此命名的辞书。^④此后还相继出现一批显示辞书性质功用内涵的辞书，如《字通》、《字说》、《字鉴》等。

但给字书下定义则肇端于《字汇》“字汇者，字学之准的也”（梅鼎祚序），勾画出了辞书作为语言文字规范书的大致轮廓。迨《康熙字典》出，玄烨帝正式命名为“字典”，并界定为“善兼美具，典常而不易者”。在梅氏定义基础上，对辞书作为标准书的质量作了初步规范。这个经长时期千锤百炼终于脱颖而出的字典概念，显示了前人对辞书的特性与功用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与拓展。

历代对辞书社会作用的理论阐发可谓多矣，主要可归纳为八点：

1. 巩固皇权国基

辞书对语言文字的整理规范，有利于皇权与国家基础的稳定与巩固。许慎编《说文》，旨在以此“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叙》）。江式编《古今文字》，正是为了让其起“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进〈古今文字〉表》）的作用。《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是基于字典能“助流政教”，对清王朝长治久安有利。

2. 统一规范语言文字，方便社会交际

向全社会提供统一规范的语言文字，是辞书的首要职责。前人对此已有理论认识。江式指出，辞书能“省百氏之观，而同文字之域”。历代有关论述可概括为三：一是清除古今方俗语言障碍，《尔雅·序篇》、《释名·释典艺》作过论述；二是不仅释字词义之“然”，还追释其“所以然”，即《释名·序》所称的展示“百姓日称而不知”的“所以之意”；三是描绘字词的历史孳乳轨迹，故能从中“备知文字之源流”（《康熙·序》）。惟其如此，辞书才如同“破暗”的“慧灯”（《慧琳音义·顾序》），起着“使览者去疑，宿滞者豁如”（《唐韵序》）的解惑答难的作用。

3. 沟通方俚，展现民俗

辞书通异语，展民俗的社会功能，历代均有论述。扬雄之作《方言》，正是由于“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帟幕之中，知绝

遐异俗之语”(《答刘歆书》)亦即从中“知天下风俗”(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上)。因此“方言即乡言”可以“通民隐,定民志”(丁惟汾《方言音释·序》),能起展现特定时代民族气质、文化心理与风土习俗的作用。

4. 传播名物知识

收名物字,传播名物知识,是古辞书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历代有关论述甚多。在许慎看来,辞书要对“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人间世事,莫不毕载”(《叙》)。刘熙要给“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至庶民应用之器,论叙指归”(《序》),即为自然人文万物命名解说。只有这样,辞书才能满足全民“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郭璞《尔雅注·序》)的求知欲。

5. 方便语言教学

我国最早的字表就是为学童识字而编纂的。颜师古于注释《急就篇》“急就奇觚与众异”的“觚”时曾指出:“今欲犹呼小儿学书木简为木觚章,盖古之遗语也。”这表明,辞书打开始就是作为文字教学工具使用的。郭忠恕认为“佩觿者,童子之事,得立言于小学者也”(《佩觿》卷上)。王安石、戴震先后强调:“教学,必自此始。”(《字说·序》,《重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序》)可见,历代是把辞书当作辅助教科书看待的。

6. 辅助笔耕

辞书能提供大量丰富的词汇,供诗文作者用字遣句时选用。胡文焕指出,辞书能为“笔耕时之一助”,“作者不于此乎参,岂能句耶”(《助语辞·序》)。为正确使用虚字,作者必须求助于虚字字典,因为“虚字一乖,判于燕越”(《助字辨略·序》)。对于方言的使用,作者也离不开辞书的帮助,这是基于“文非方言,则又不能曲折之尽意,故不知方言者,不可以言文也”(《方言藻·序》)。李调元于此强调的,正是方言字典辅助笔耕的功能。

而韵书对写作者，不仅能提供“借文用意”的指导，还可使其避免“误使音韵”（《集韵·修书本末》），从而在审音用韵上“令清浊昭然”（《唐韵·序》），“朱紫洞分”（《广韵·敕》）。上述阐论，已将辞书辅助笔耕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7. 振兴民族文化

著名的文史学家冯天瑜曾指出：“中华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为汉字、儒教、中国式律令、中国式科技、中国化佛教。”^⑤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丰富深邃，而其首要因素正是汉语言文字。准此，记载语言文字的辞书，理所当然地成为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辞书既是一国文化的缩影，那么，以入典字词展现民族精神与文化风貌，正是辞书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徐锴对入典的语言文字的看法是：“文字者，天地日月之经也，忠孝仁爱之本也，朝廷上下之法也，礼乐法度之规也。”（《说文系传·系述》）王安石则指出，辞书中的字词包含有哲学、伦理等古文化内涵，倘能令人人从中“知之”，“则于道德之意，已十九矣”（《字说·序》）。而记录佛经文字的辞书，具有“正于名言”，“披教悟理”（《龙龕手鏡·释智光序》），亦即传播教义、解答习经疑难的效用。可见，辞书的释疑解惑是与振兴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的。

8. 识古垂后，功在永世

储存民族文化与语言文字的辞书不仅利于当世，而且功在后代，亦即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垂范后世。许慎指出，《说文》不仅“解谬误、晓学者”于汉世，还要让它起到“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叙》），也就是让后人识古而知今，温故以知新的垂范作用。刘熙认为，辞书的垂范作用，才使得辞书具有“著之简纸而不灭”（《释名·释书契》）的历史价值。宋代皇帝构想中的《广韵》，既要有益于当世，又应“垂示将来”（《敕》）。《康熙字典》则矢志于字典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垂示永久”（《序》），代代相传。这些论述的正确性早已为历史所证明。

可见历代学者对辞书的概念、性质特征，以及社会地位、作用与价值，是颇有认识，且作过大量的虽嫌肤浅但却合理的理论阐述。它对历代辞书编纂与研究起过指导作用。

(三)

在长期辞书编纂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旨在规范编纂工作的辞（字）书编纂的原则、条例与方法，即辞书编纂法，主要包括收词立目、词目诠释（形、音、义、证）与字词排检三大项。辞书收词要求收语词，兼收部分名物词，其论述屡见于《说文》、《释名》等辞书的序叙与凡例。辞书排检先后出现三大原则：形序，“分别部居”，“据形系联”（《说文·叙》），“以形相从”（《类篇·序》）；音序，“随韵编纪”（《唐韵·序》），“以声相从”（《类篇·序》）；义序，“以类求之”（《释名·序》），“以类相聚”（《类篇·序》）等等。至于词目诠释，形音义处理，情况较复杂，今从四方面综析之。

1. 以形析义

许慎“六书”（主要是前四书）新论，为《说文》以形析义（本字本义）莫立了理论基础。而辞书列形理论则首见于江式《进〈古今文字〉表》。他指出：“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而列形的用意就在于，以时序展示汉字不同形体“各有区别”的变化。陆德明也主张在字头下收列字的“别体”（《经典释文·序录·条例》）。《玉篇》一改许书以小篆为正体的传统，确立以楷书为正体。《六书故》则试图以金文为正体，无金文的字用小篆，其说虽欠妥，然不失为有参考价值的创见。至晚清，罗振玉、王国维等提出以出土甲骨、钟鼎考释本字本义，我国形训理论逐渐趋于科学化、现代化。

2. 以声求义

古代辞书以声求义的论述，计包括声训、声转、假借、谐声见义与音义结合五大内容：

(1) 以同音（双声叠韵）训义为特征的辞书声训实践，发端于《尔雅》，初备于《释名》。声训理论阐发首见于郑玄，他认为，声训的实质是“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见贾公彦《周礼正义·序周礼废兴》引），这也无异于对声训的特性与功用作出初步理论界定。后代学者虽时有论述，但声训理论研究却长期落后于编纂实践。

(2) 将以声音变化追溯字义的“声转”（一声之转）用于辞书编纂，萌芽于《方言》的“转语”，它最初是当作沟通异域方言的训释方式运用的。而逐渐形成理论框架当归功于戴侗。他在《六书故》中首次提出“一声之转”概念，主张“从声转中求字义”（《六书通释》）。至清代，出现辞书性质的转语著作《果羸转语记》（程瑶田编），戴震则提出“以转语之法类推”（《转语二十章·序》）的编纂准则。而声转理论全面验证于字典，则是由《广雅疏证》的作者王念孙来完成的。他强调，声转法可使声同字义“触类旁通，昭然若揭”（《果羸转语记·王序》）。二戴一王的转语论，是古辞书以声求义理论的精粹。

(3) “假借”在古代基本上分为两类。郑玄提出“本有其字”的假借，其特征是“仓促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见《经典释义·序录·条例》引）。许慎则提出“本无其字”的假借，其特征是“依声托事”（《说文·叙》）。戴侗对本有其字的假借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是“借他文以备用”，“义无所因，特指其声”（《六书故·六书通释》）。《集韵》则开始将假借正式列入凡例。但假借理论的体系化是于清代始完成。戴震、朱骏声的“四体二用”说，发展了假借论。他们把假借（与众说纷纭的转注）作为用字之法。其对假借论的建树有三：一是合理确定假借的概念，如“假借以音为主，同音相代”（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古音